

50 河北中青年社科专家五十人工程文库

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

ZHONGGUO GONGCHANDANG BAKAN FAXINGSHI

中共新闻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考察之一

王晓岚 著

ZHONGGUO GONGCHANDANG BAKAN FAXINGSHI

ZHONGGUO GONGCHANDANG BAKAN FAXINGSHI

ZHONGGUO GONGCHANDANG BAKAN FAXINGSHI

ZHONGGUO GONGCHANDANG BAKAN FAXINGSHI

ZHONGGUO GONGCHANDANG BAKAN FAXINGSHI

ZHONGGUO GONGCHANDANG BAKAN FAXINGSHI

ZHONGGUO GONGCHANDANG BAKAN FAXINGSHI

ZHONGGUO GONGCHANDANG BAKAN FAXINGS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河北中青年社科专家五十人工程文库

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

中共新闻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考察之一

王晓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王晓岚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04-7859-1

I. 中… II. 王… III. 中国共产党—党报—报刊发行—新闻事业史 IV. G21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0269 号

策划编辑 冯 斌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近两年，河北省组织实施了“河北中青年社科专家五十人工程”，并计划利用几年的时间编写出版“河北中青年社科专家五十人工程”文库。目前即将出版的有《商品流通领域研究》、《富民经济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论嬗变》等六部书稿，还有十部书稿计划陆续出版，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许多学科，涵盖了许多前沿性问题，仅从书的名字即可知其意，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努力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对现实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不难看出，河北的中青年社科专家年富力强、视野开阔、治学严谨，具有适应时代要求的综合素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河北社科理论队伍人才辈出、社科事业兴旺发达的繁荣局面和美好前景。

我们知道，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是理论上不停顿。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直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就是因为它善于根据发展变化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不断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全新的认识，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系统的阐述，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了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践证明，我们党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的每一个成果，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必将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和党的建设事业的新发展。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有许多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我们去研究、探索和回答，这既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对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考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纷繁复杂问题的指针。无论从事何种学科的研究，都必须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必须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打牢深入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根底。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学习哲学，有助于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坚持与时俱进，要加以丰富和发展。例如关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对象需要进一步明确，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时，指的只是世界观的对象，而认识论的对象是什么，还不太明确。又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有待补充，结构需要更加严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建构体系的原则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得到公认的。但是，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哲学家主要不是根据这一原则，而是根据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来建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的。再如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科学的进步加以修正，如宇宙起源和演变的理论、物质的构成与内部结构的理论、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等等，都需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不断的进行发展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勇于肩负起这一责任。哲学如此，其他各门学科也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大有可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努力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为他们提供了不断创新的广阔舞台，中青年社科理论工作者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刻苦钻研，扎实工作，不断创造出更大的成绩。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以老一代学者为榜样，树立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甘于清贫、耐住寂寞、潜心研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注重研究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促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蓬勃进行。要坚持从自己所处的省情市情出发，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多开展应用对策研究，研究本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有条件的可发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在《文库》出版之际，我表示衷心的祝贺，也希望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涌现更多的优秀人才，创造更多的优秀成果。

黄耕森

2005年4月

序 章

本书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考察之一。作为系列研究的发端，有必要在这里对中共新闻思想的历史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第一节 党报管理思想的发轫

中国共产党对党报的管理，是随着党的成长壮大而趋于完善的。党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借鉴外来经验和总结国内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办报的经验教训的同时，对党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措施，为党的报刊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有一些已经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刊，如上海的《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广州的《广东群报》和《劳动与妇女》周刊；北京的《劳动音》周刊，以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劳动周刊》等。与此同时，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还不断把他们了解到的国际共运情况及外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情况介绍给国内。例如，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从法国写信给毛泽东，在介绍了国际共运的有关情况后，还详细陈述了他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现在组织研究宣传部之外，更可组织一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调查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现在可打成一片而潜在从事。比如我在外国可调查俄国及各国情形，你在国内

可调查各省情形，将人口、土地、产业、交通、劳动状况、经济、教育等列为统计，此种材料与研究的著作，皆在一种出版物上发表，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①又如，1921年6月12日，张崧年在考察了英法共产党后，给陈独秀写信说道：“法国共产党因袭旧时的底子，党费甚富；机关报：日刊有五种（均直标明为共产党报，其中以L’ Humanite最著名，销行最广），月刊周刊有四十余种。但虽如此，势力仍远敌不过国民总会（Bloc National即政府党）。惟与英国共产党（此党之基本原叫不列颠社会党）比要算好多了。英国共产党新近因译刊共产世界工人会第二次会议议决的案文，被政府搜查一空，捕去两个重要党员。在法国的出版物便自由多了。英党正式的机关报，只有一个周刊，从五月起加了一个月刊（The Communist Review）。 ”^②这些国际共运情况及外国共产党机关报刊的情况，尤其是他们的认识和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们不无一定的影响。蔡和森是主张出版党报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并提出了党报管理思想，即党的报刊必须经过党组织的审查，绝不登载与党的主张相左的文章。这一思想后来一直贯穿于蔡和森担任党的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党报工作的整个时期里。毛泽东当时对蔡和森的这一思想表示完全赞同，并极力称赞《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③

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从国情出发，根据自己的实际力量，都以宣传鼓动为主要活动内容，所以对党报这一宣传鼓动的工具都十分重视。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党报工作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报告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去年，……我们回到广州的时候，创办了《社会主义者》^④日报，但不能说《社会主义者》就是某种组织，他是一个宣传机构。1月，陈独秀同志来

①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② 《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1921年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3号。

③ 《毛泽东给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④ 应为《广东群报》，原注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到广州，……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该报每月需要700元，很难坚持下去。……每月从党员的收入中抽取百分之十来维持《共产党》月刊和负担工人夜校的费用。”还有《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也写道：“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劳动者》周刊^①，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在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可见，党报工作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党的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建党初期，党报工作几乎成为党的最主要的工作内容。

当时全国党员只有50余名，“我们人手还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集中全付精力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②党报便成为这种宣传和组织工作的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党的主要领导者们也都从事党报工作，参与或主持一种或数种党的报刊的工作。如《新青年》由陈独秀主编，《共产党》由李达主编，《劳动音》由邓中夏主编，《工人周报》由罗章龙主编，《济南劳动周刊》由王烬美主持，等等。其中《共产党》月刊在当时秘密编辑发行，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必读材料之一。它着重宣传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和有关党的知识，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初期的党报由于鼓动性强，颇具号召力，反动当局禁之唯恐不及。到1921年初，许多地方的党报或因被当局查封，或因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刊了。

中共一大根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和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中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

^① 应为《劳动音》周刊，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9页。

^②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4页。

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无论地方或中央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①。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② 决议对党报提出了组织管理和纪律管理的规定办法。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这种管理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思想理论上的统一性、战斗性。这是党统一管理党报的开端，在党报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大后，党内一些错误倾向开始抬头，其影响渐渐扩大。在党报方面，其代表人物为李汉俊。据蔡和森讲：李汉俊反对党从事政治运动和宣传，反对党有政治机关报，“他以为我们的势力很小，是不应该就作政治宣传的，这些政治工作让其他党去做好了。汉俊、望道都反对党的宣传和传单，……并且他们以为宣传政治是很可笑的，因此，他们只注意本身。他们对政治机关报是很漠视的，而他们对组织根本反对集权，……反对铁的纪律，以为这就是专政。”^③ 党的二大时，李汉俊的思想已经定型。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意见书“托振法同志从河南带至大会”^④，自己则自始至终没有参加大会。李汉俊的主张受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与会同志们的批判。经过这场斗争，党内取得了共识，即：党必须有党的机关报，以此作为宣传工具，大力进行革命宣传，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并对党报进行严格管理，使之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为党的方针政策服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二大通过的一系列重要的决议中看出。如《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决定：“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无论何时何地个（各）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将“领导”译为“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7页。

③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81页。

④ 同上。

各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① 这些纪律规定同样见诸于对党报的纪律管制上。按此规定，党报内部组织亦须严密而系统，以确保绝对服从党中央决定。其报刊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不可任意做主，违反党的政策。这一点在后来一直成为党报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到1923年7月中共召开三大时，党已开始注意党报的经济管理。三大会议上，陈独秀报告了党报的工作情况和党的经费使用情况。他说：“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② 陈独秀报告之后，有位同志发言，提议说：“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党应该建立起更好的组织，明确规定出版杂志的费用。”^③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诸文字的最早的关于党报经济管理的提议，可惜没有形成决议。

这次会议，党明显加强了对党报的管理，明确规定由党的最高指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④ 有关党报的重要事宜，一般也都是在党代会上决定。如为了系统地指导全国妇女运动，并为妇女运动树立一个精神的中心，中共三大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其中第三条指出：“应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并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⑤ 同年8月，由妇女部主任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刊》在上海创刊。

党报的工作人员多是党员，党员自然要受党章的约束。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十一条和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第二十二条都同样规定：“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

①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91页。

②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68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第525页。

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6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56页。

⑤ 《妇女运动决议案》（1923年6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55页。

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是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党纲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① 组织纪律上的一贯性，保证了党和党报在政治上的一致性。此时，党对党报管理的手段也主要表现为政策管理和组织纪律管理。

中共负责对党报进行具体管理的最早组织机构，是1923年10月由C. 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的缩写，即中国共产党) 及S. Y. (The Social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的缩写，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两中央共同组织成立的教育宣传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党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形和党的教育与宣传工作的需要而设立的，由C. P. 及S. Y. 两中央协定委派17人组成。具体负责人有蔡和森（《向导》主编）、瞿秋白（《新青年》主编）、彭述之、恽代英（《中国青年》主编）和高君宇（《向导》编辑）。该委员会政治上的指导直隶于党中央。

教育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通讯部、印行部和图书馆等，分别负责党报的编辑、印刷发行和资料保存等工作。编辑部负责编辑8种出版品。其中C. P. 的有：《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向导》周刊、《党报》不定期刊；S. Y. 的有：《青年工人》月刊、《中国青年》周刊、《团镌》不定期刊和小册子。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以上每一种刊物均要有一个专门负责的人。

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等都是为编辑部服务的。编辑部将所需之材料交由通讯部编译。通讯部下设8个股，其中有杂志股和报纸股，它们将各国杂志和报纸的有关资料进行编辑，以供编辑部和C. P. 与S. Y. 两中央参考。印行部的发行工作则以周刊敏捷为第一要义，“对于刊物之分配于党或团内者当于印出后第一批发出”。^②图书馆则将党、团及各工会之

^① 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96—97、162页。

^② 《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研究所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刊物保存4份，并将以前自己的刊物收齐2份保存。为了监督与控制党员在政治上的表现，中共责成“各同志自由发表之文章、书籍（杂志）凡稍有政治性质者，必须送两本与教育宣传委员会存图书馆”。^①可见，这时党对自己的机关报刊已开始加强监督措施，从内容、人员设置到党报发行，管理都已制度化、系列化。

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成立后，各地方委员会中也选出一人专门负责教育宣传工作。由其整理教育宣传委员会定期刊物中的政治材料，并提交当地平时大会讨论，然后将讨论的经过和结论，每个月向教育宣传委员会作一次报告。而教育宣传委员会则至少每月开一次会，以审查各部成绩并讨论工作进展的方法。至于应有哪些人出席这种会议，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亦有规定，即C. P.、S. Y. 两中央各1人，5部主任各1人，但编辑部须有2人。^②这不仅仅因为编辑部有8种出版品，而更主要的是党报宣传工作是当时党的工作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内容之一，所以在出席会议的人员安排上，对编辑部也稍有偏重。

在教育宣传委员会这种每月一次的例会上，各部都要报告本部的工作成绩，“编辑部当报告出版成绩——某种刊物已出几期，此月中所注重之问题何在，何故注重于此数问题。……印行部报告分布刊物之成绩，出作品刊物之销数及收入（造统计表）。图书馆报告新购书籍书目，所收到之赠送书报（本团本党尤为重要）”。^③这种例会制度和报告制度较之以前一年一次的党代会上的中央报告和各地党组织的报告又前进了一大步，它使党能够比较及时地掌握党报工作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使党报能更及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为党的各项工作服务。

有了较完善的管理制度，更便于党利用党报开展工作。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议决案规定了党在当时的政治、劳动、农民、文化四方面的宣传方针，指示“C. P. 所能支配之新闻机关者”，当注意“各省的现实政治

^① 《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研究所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同上书，第10—11页。

之批评”，集全国目光于直系，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宣传与介绍其他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并注明“尤以反对英美及直系为最重要”。^①此后，党报按照这一决议精神积极进行宣传，在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甚巨。这在党报管理上也形成了一大特色，即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指示党报对某个问题展开集中的宣传或批评，以造成某种强度的声势。

《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还指示将已有的《工人周刊》和《劳动周刊》尽力在工人和党员中推销，以扩大党的宣传的影响，并号召“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Popularization）。”^②可见，党在当时已意识到并明确规定了党员对党报具有义不容辞的宣传和推销义务。这是由当时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再加上为数不多的党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党报便成为党实际上的联络员和组织者。党通过党报宣传把各地党员的思想统一起来，组织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在这种情况下，党对于党报宣传内容的管理便十分严格，党报如同党的文件一样在各级党组织中成为学习和讨论的材料。如在《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就有多处谈及这点。这样，党便要求党报具有高度的指导性，成为革命群众指路的明灯。对于这样的党报，多推销一份，就多增加一份革命的力量。所以党要求党员极力宣传和推销党报，并在后来多次指示各地方党委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党报宣传也并非强迫人们接受，再三申明有疑问时，“可寄到名义上的‘社会科学会’（即中央教育委员会）令答复”。^③党报则根据反馈的信息进行有的放矢的理论解释和宣传。这种党报管理一方面解决了党员的思想问题，一方面也保证了党组织的团结和统一。

① 《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3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205页。

②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205—207页。

③ 《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3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208页。

谈及中共党报管理思想的发轫，我们不能不涉及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国共产党党报管理的参与和影响。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为了交流各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斗争的经验，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论、战略和策略、组织等基本问题，批判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和流派，于1919年5月1日创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所有重要事项均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决定。如1921年9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会议，决定以后《共产国际》杂志以160页的篇幅出版，杂志主编由格·季诺维也夫担任，另设编辑部，并确定了各栏目的主管人等。

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机关报如此管理，同时他对加入自己组织的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也进行宏观上的管理和政策上的指导。1921年6月出版的《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6—17期发表了1921年2月1日以前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机关报、刊物一览表。表中包括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所属组织（红色工会国际、青年国际）及所属25个国家的支部机关报、刊物共248种。对于这些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要求各国支部“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中）所担负的比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并且“不管整个党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①共产国际还要求各国支部将自己的出版物送交执委会，以便进行监督和管理。如1922年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知各国共产党中央，要求他们把自己出版的关于妇女工作的出版物送交国际妇女书记处，并在党的报刊上开辟妇女运动的专栏。这样，共产国际通过对各国共产党党报的统一管理，在世界上造成一股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声势。

先后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人，在中国活动时，

^①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202页。

把共产国际对党报管理的办法和经验也带了进来，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尽管中共一大时还没有加入第三国际，但在中共的第一个纲领里明确写着“联合第三国际”，并且还在党的第一个决议里明文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从组织上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到中共二大时，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①此时，中共对党报的管理便完全纳入了共产国际的管理模式。

在事实上，中共初期的党报无论是创立还是管理，都无不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一方面，中共中央主动与共产国际联系、汇报，如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多处谈到了党报的现状。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党报也十分关心，并给予一定的资助。《新青年》就是从1920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并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的。^②党成立后，党的经费也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得到的。^③除了物质上的帮助，共产国际还积极参与了中共报刊的创立、编辑和管理。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谈道：“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出版的周报和以刊印翻译稿件为主的《共产党》月刊正常地出版着。由于内容相同，我们试着把《新青年》与《共产党》月刊合并为一个刊物。在我离开以前，《共产党》月刊已停止出版了。我们曾和党中央商讨出版一种政治性的周报，但直到4月为止，这个计划一点也没有着手。”^④共产国际对它所属的各国支部的管理往往采用强制命令手段，对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在马林报告之后，于同年7

①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67页。

② 参见K. B. 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

③ 参见《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68页。

④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1页。

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示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工作必须在和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此后，马林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创立、编辑和管理。关于这一点，蔡和森、徐梅坤、罗章龙等分别撰文回忆说：“党决定在北京办一《远东日报》（1922年8月决定），专是宣传国民革命，而经国际代表马林，但他反对，理由如下：第一，本党能力不足；第二，恐不久被封闭；第三，以为党当时不应该办这样大的机关报，只应办一周刊等。”^①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马林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同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个正式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而“办《向导》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马林从共产国际拿出钱办的。我们自己的党费非常少”。^② “马林曾担任《向导》编辑，很刻苦，每篇稿件都要我翻译讲给他听，不对的地方，就提出看法，要求我们改正”。^③ “马林以‘孙铎’的笔名在《向导》上也发表过几篇文章”。^④

《向导》创刊后，中共中央对它十分重视，这从它的编辑阵容就可窥见一斑。当时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独秀和宣传部长蔡和森，他俩给《向导》写的文章也最多。此外，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高君宇等人也参与了《向导》的编委会工作，经常写一些文章，批评时政，指导各地党的工作，从而使党报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

共产国际对《向导》也十分重视。据罗章龙回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伍廷康也都是编委会的成员。^⑤ 他们参与了《向导》宣传方针的制定，并在实际上起着把关的作用。毋庸置疑，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是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双重管理下编辑出版的。

共产国际的管理方式保证了各国共产党政治上的一致性和战斗性。尤其是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物质上和策略上的帮

①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见《“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2页。

② 《徐梅坤回忆〈向导〉的出版发行情况》，见《“二大”和“三大”》，第670页。

③ 《罗章龙回忆国际代表马林》，见《“二大”和“三大”》，第665页。

④ 《徐梅坤回忆〈向导〉的出版发行情况》，见《“二大”和“三大”》，第668页。

⑤ 罗章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党史资料丛刊》第三、四辑。